

來臺陸生的對臺觀感與政治態度： 來自太陽花學運之後的對話

單文婷、朱灼文*

摘要

本研究在太陽花學運結束的兩個月後，以焦點團體法探討來臺陸生在廣泛的跨文化社會接觸後之對臺觀感與政治態度。研究發現陸生對臺灣的經濟發展、社會自由、與新聞素質評價不高；學運則衝擊了他們認知的兩岸政治定位，有人在發言中顯現對臺灣的認同、並想像大陸的民主願景，有人則設下認同底線以避免自我迷失。結論是學運可以檢驗社會接觸的效果：來臺時間長、實質性接觸多的陸生易於透過學運證實對民主體制的想像；來臺時間短、社會接觸偏偶發性的陸生則易於只看到學運裡的仇中意識。

關鍵詞：來臺陸生、社會接觸理論、太陽花學運、跨文化傳播

*單文婷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助理教授。聯絡方式：win65913@yahoo.com.tw
朱灼文為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聯絡方式：chowen@ntu.edu.tw

壹、研究問題

這是一名參與太陽花學運的陸生在部落格寫的觀察與感想：「學生『攻佔』立法院！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真實地體驗到大規模的學生抗議運動。……我之前一直認為臺灣學生攻佔立法院這樣的民主缺乏理性，但現場的情況成功地說服我改變觀點。……回去之後我有一種很強烈的願望，就是想把現場的情況講給大陸的朋友聽，希望他們看到臺灣更加真實的一面。……臺灣民主在亞洲國家中是絕對的佼佼者！這次政府與抗議群眾間的不斷協商也讓我看到民主的力量（小可，2014，一位陸生的學運觀察日記）！」¹另一名參加本研究焦點團體的陸生也談到親身參與學運的感受：「這是我來臺灣後感受最強烈的事件，這些抗議的學生們很勇敢，不畏懼司法，表達自己的訴求。或許他們方法（攻佔立法院）錯了，但整個學運活動是自由民主的反映……我會希望有一天在大陸也可以這樣做。」（A5）¹

為期 24 天的太陽花學運在抗議學生和平離開立法院後畫下句點。對在臺陸生來說，整天密集地從周圍環境或媒體上聽到「反黑箱」、「反中國」、「退回服貿」等與兩岸經濟、政治的相關訴求時，其內心有何感想？這場學運在筆者們任教的班級也成為大家熱議的話題，在筆者們課後探詢下，有為數不少的陸生曾自行前往立法院周圍觀摩或參與學運活動。即便他們對學運的評價有正有反，但常有陸生感嘆在臺灣能自由參加抗議的可貴，這也使得他們對臺灣的民主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我們開始想深入了解：陸生心目中臺灣民主社會的圖像為何？他們又如何看待太陽花學運？此學運帶給他們什麼政治啟示？

自從民國 100 年開放陸生來臺就讀後，無論研修生（含交換生）或正式修讀（學士或碩博士）學位的學生都快速增加，至 103 學年度陸生總數已達 33,288 人，居在臺外籍生之冠。²這些數據反映在各大校園中的變化是：陸生人數明顯變多了，在課堂中也常見兩岸學生一起上課、分組作業、或參與社團活動等景象。根據教育部和陸委會評估，開放陸生來臺不僅可

¹ A5 是受訪學生的編號，請參見本文表一。

² 研修生係指來臺停留一年以下之學生。教育部統計處資料顯示，101、102 和 103 學年度大陸研修生人數分別為 15,590、21,233、27,030 人，同期正式修讀學位的陸生人數則分別為 1,864、3,554 和 5,881 人。這兩類學生人數還需加上華語文中心的陸生才是陸生總數。

緩解各大專院校未來因少子化所面臨之生源急速減少的困境，同時也可增進陸生對臺灣生活方式與民主自由的了解，由課堂互動中建立兩岸大學生的互信基礎，長遠來看將有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王嘉州，2011）。

隨著兩岸大專校院與青年學子頻繁交流，學界也開始關心兩岸教育交流對於青年學子的政治態度有何影響。不少學者發現兩岸交流將影響民意結構，亦即兩岸青年經過互動接觸後，其政治態度均容易產生趨同改變（Chao, 2003；Keng, 2007）。陸生經過至少四個月的在臺學習與人際接觸，其政治態度、對於兩岸統一的態度、與國族認同等均會產生程度不一的變化（王嘉州，2012a；李佩雯，2014；胡紹嘉，2012；柯曉翔，2011；藍振弘，2013）。這些研究多數是採取問卷調查法搭配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較少見以深度訪談法或焦點團體法來進行分析（李佩雯，2014）。為了避免政治話題造成陸生不安而影響資料蒐集之準確性，本研究選擇從「詮釋現象學」的觀點出發，以「社會接觸理論」為框架，透過讓陸生能暢所欲言的焦點團體法，考察陸生在臺體驗太陽花學運後對臺灣代議民主、言論自由、公民社會、與多元認同等現象的政治態度，並探討其在臺期間的跨文化社會接觸是否會影響這些態度的形成和變遷，期盼以此作為兩岸學生交流相關研究之補充。

貳、文獻探討

一、跨文化社會接觸的影響力

「社會接觸」（social contact）係指人與人之間、或團體與團體之間的交流過程，它之所以重要是由於人們透過接觸可能會改變先前對所接觸者的刻板印象，但也有文獻指出接觸者可能會產生更負面的印象（Grothé, 1970；伊慶春、章英華，2006；傅仰止，2001）。社會接觸向來是社會學研究中用以觀察族群間偏見、歧視或喜好態度變化的重要理論，如早期學者Bogardus 觀察不同群體對彼此的友善或厭惡態度後發現，人們的好惡並非一成不變；即使先前受到大眾意見影響而存有刻板印象，但在親身接觸後往往會使其態度轉變，無論這變化的速度是快是慢，個人直接或間接的接觸都是改變人們社會距離的重要基礎（Bogardus, 1926）。

Allport (1954) 提出最具代表性的「接觸假說」(contact hypothesis)，其研究發現兩個原先持敵對態度的團體，在適當情況下經由頻繁接觸而相互熟識了解，不僅有助於消除彼此敵意、破除刻板印象，更能避免團體成員以「類屬」方式將其他族群成員貼上敵對或不友善標籤。Allport 進一步提出「團體間的接觸假說」(intergroup contact hypothesis)，他將團體間的接觸區分為「實質性接觸」(true acquaintance) 與「偶發性接觸」(casual acquaintance)，前者為雙方因制度所支持的頻繁接觸而降低成見、產生信任感，後者則反而可能造成彼此成見加深、擴大雙方距離感。Allport 研究的重要貢獻在於其整理出了可供檢驗的社會接觸分析項目，他認為唯有在接觸雙方社會地位相同、有共同理念和目標、團體間有接觸的必要，以及有外部社會制度的支持之前提下，團體或族群接觸才可能導出正向關係發展 (Allport, 1954: 281)。

Cook (1978) 發現像個人特質這種人際間的吸引力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對於態度改變或消除偏見有極重要的影響；Hewstone 與 Brown (1986) 的研究則關心如何從個人層次的接觸經驗延伸至團體層次；另有學者發現接觸者的社會地位高低，以及學習異族文化新知的教育途徑都會影響社會接觸效果 (Stephan & Stephan, 1984；Triandis, 1994)。有時透過跨文化社會接觸不只可以使互動雙方從內心消除偏見和敵意，更能進一步改變行為或產生認同 (Jackman & Crane, 1986)。Aronson 與 Patnoe (1997)，以及 Pettigraw (1998) 的研究則都發現，無論是自願接觸或被迫接觸，當個人或團體成員彼此間存有不協調的認知或態度而必須進行調整前，他們會先「改變行為」，例如主動參與活動、結交朋友、參加或組織社團，這些行為都會增強互動雙方修正態度的意願或提高對彼此的認同感。許多接觸理論的實證經驗研究均呼應上述觀點，近幾年也有臺灣社會學者從行為改變探究異族通婚與新住民社會適應等問題 (伊慶春、章英華，2006)。

Hamberger 和 Hewstone (1997) 針對英國、法國、德國、與荷蘭進行大規模調查發現，在控制了教育、年齡、政治傾向等變項後，凡是有結交異族朋友者，其對於異族的偏見歧視明顯降低許多。還有不少研究也都指出友誼式接觸的正向效果 (Pettigrew, 1998；Power & Ellison, 1995)，無論是不同國族、種族、文化、或宗教，友誼式的重複接觸經驗都將有助於消

除彼此偏見，產生認同的心理基模（schema）。由於陸生結交臺灣朋友的情況非常普遍，因此是否會使這些陸生產生行為或認同態度的轉變，將會是本研究觀察討論的重點。

一項針對南非白人進行的電話調查顯示，跨種族社會接觸的頻率和品質會正向影響受訪者對種族隔離補償與矯正政策的支持度，但其效果會受威脅感、公平感、與種族偏見這些因素影響（Dixon et al., 2010）。另一份在美國控制了教育和社經階層變項的調查研究發現，抽象推理能力的缺乏容易導致對同性戀的偏見，此關聯性在偏好威權主義以及較少接觸同性戀族群的人身上更為顯著（Hodson & Busseri, 2012）。在彙整了大量經驗研究的結果後，Al Ramiah 與 Hewstone（2013）認為不同族群間的社會接觸乃是避免他們發生衝突的重要手段，但社會階層懸殊的跨族群接觸則效果不佳，因此公部門應妥善設計制度，鼓勵族群間發生更健全的社會接觸。

近幾年針對兩岸的相關研究顯示，意識形態對政治態度的強力影響可能超過社會接觸效果（王甫昌，2003；陳志柔、于德林，2005）。然而，也有學者主張社會接觸乃是根本的社會結構因素，政治意識或許能在短期間影響個人或族群態度，但長期持續性的社會接觸對於個人或族群態度的改變仍有其關鍵作用（伊慶春、章英華，2006：194）。另有學者指出社會接觸與政治意識不一定是相互對抗，反而可能因兩者的交互作用而改變了個人或族群的態度，進而催生相近的認同感（章英華、伊慶春，2006）。這些觀點也提供了本研究另外一種思路：或許經由跨文化交流不一定能立即明顯地改變兩岸學子的兩岸觀、政治態度、及深層的意識形態，但這期間的種種社會接觸可能已使其內心深處產生細微的變化。

一般而言，來臺陸生因為語言相通而較少有生活適應不良的問題。筆者們也發現陸生剛來臺時最不適應的與其說是生活環境，不如說是民主、自由、與開放等價值觀；此外，也有文獻指出陸生會對臺灣民眾的國族想像產生抗拒心理（蔡翠旭、林翠蓉、陳怡珮與程伊昉，2012）。近年國內以社會接觸理論為主要論述依據的研究多半證實：頻繁的社會接觸有利於適應異文化社會並改善對異文化社會的印象（楊開煌、劉祥得，2011；章英

華，2011；蔡明璋，2011；張翰壁、張晉芬，2013）。根據筆者們的觀察，陸生在臺灣課堂內外頻繁的人際傳播和互動確實有助其了解兩岸現況，進而降低其心中對臺灣民眾政治立場的抗拒心理。本研究即為對此觀察所做的深入查核。

二、有關陸生政治態度之相關研究

過去隨著兩岸教育交流日漸頻繁，學者除了關心赴陸訪問的臺生之政治態度變化外（王嘉州，2010.11；王嘉州，2012b；耿曙、曾于蓁，2010），也會以陸生為觀察對象，探討在累積學習經驗與適應生活環境時，其兩岸觀或政治態度有何轉變。例如王嘉州（2010.11：13）從政治社會化的角度連續多年觀察陸生的政治態度變化，他發現男同學較女同學更認同臺灣，而越頻繁地與臺灣老師討論政治話題，也越容易認同臺灣的體制，對臺灣的主權容忍度也相對較高（王嘉州，2011：90）。王嘉州（2012a：108）發現陸生與臺生相互幫忙的頻率、是否觀察過臺灣選舉，以及接觸兩岸新聞報導的程度，這三項因素都會影響陸生對統一的態度，前兩者的經驗促使陸生的統一態度朝向「維持現狀、日後再統一」，但接觸兩岸新聞報導越頻繁的陸生則越傾向支持「儘快統一」。

另外，部分研究主題雖然並未直接與陸生的政治態度變化相關，但在研究中也提及了陸生的政治態度。柯曉翔（2011）的研究顯示，許多陸生因為在臺灣生活中學習和感受到自由民主氣氛，而對過去大陸的黨國價值觀產生質疑，甚至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發生認知矛盾，進而重新建構屬於自己的社會價值意識。然而林家正（2011）也發現，許多陸生認為臺灣居民普遍對大陸存有負面的刻板印象，甚至因此讓陸生們備感歧視，難以真正融入臺灣的生活環境，而這些因素會連帶導致部分陸生對臺灣的自由民主體制持負面態度。目前看來，陸生在臺時間愈久，其社會意識與政治觀念的轉變愈為明顯。李樑堅等人（2013）藉由問卷調查法探討來臺陸生就學感受時就有類似發現，亦即待在臺灣時間較久的正式學位生較平均僅待四個月的交換生更認同臺灣實施的自由民主制度，並且更肯定臺灣社會的高度包容力。

胡紹嘉（2012）與李佩雯（2014）是少數採取跨文化、跨群體溝通觀

點的陸生研究。前者的研究發現陸生來臺後最大的挑戰即是面臨身份認同上的認知失調，後者的研究則顯示陸生與臺生對於族群認同、國族與政治認同的差異極大，即使經歷了校內的人際接觸或課堂的交流互動，也很難改變雙方心中對彼此的既定認知。藍佩嘉和吳依凡（2011）也指出陸生在臺生活體驗不必然會改變其原有的主觀態度，他們或許會因為社會接觸而更了解臺灣特殊的政治定位，但不一定代表其認同這樣的定位。

龔儀等人（2015）的研究發現在臺陸生的學習文化對其適應臺灣社會環境的影響最為明顯，學習文化意指陸生無形的學習價值觀（如理念、態度、和習慣等）或有形的課程學習行為，越融入臺灣學習文化的陸生越適應整體的臺灣社會。此外，陳怡如和余元傑（2014）觀察在臺陸生的社會支持與生活因應方式後發現，多數來臺陸生都能感受到臺灣師長的情感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包括正面的情感表達、對課堂表現的肯定，以及對生活的關心等等；這不僅有助於陸生適應臺灣的社會文化，對於其寬容地看待兩岸關係亦有正面幫助。

社會接觸是從個人展開，由個人接觸到團體接觸，進而影響或改變個人對族群、國家，和文化之整體觀感（楊開煌、劉祥得，2011：48）。回顧文化認同理論，Hall（1990）曾提醒價值認同並非是固定不變的，它是一個不斷流動與重構的動態過程，Kim（2002）則認為外來者適應新文化環境會出現「壓力、適應、成長」三階段論。儘管不少前述以陸生為研究對象的文獻顯示，陸生因為更了解臺灣的社會文化而逐漸轉向認同臺灣的民主制度（柯曉翔，2011；王嘉州，2012a；胡紹嘉，2012），卻也有結論相反的研究（王甫昌，2003；陳志柔、于德林，2005；耿曙、曾于蓁，2010；李佩雯，2014）。這種分歧的結果正凸顯了社會接觸與文化認同的複雜本質。

總地來說，無論是探討來臺陸生學習感受、人際交往、社會適應，或政治態度的研究，幾乎都指出「接觸」是影響陸生在臺觀感的重要因素。我們認為正如許多文獻所顯示的，陸生在臺從事社會接觸的質與量必然會影響其對臺觀感，甚至觸動其國族認同或政治態度。這幾個變項的複雜程度都不容易用量化的問卷調查來細緻處理，因此本研究採取焦點團體法的

策略，嘗試側寫大陸學生在跨文化互動下的社會心理狀態，以期捕捉在這個過程中更生動的有機變化。

的確，來臺陸生在政治認知上的進退周旋是臺灣學術界內外都很感興趣的部分，本研究也亟欲藉由太陽花學運這個時機來考察相關議題。然而在本研究進行的過程裡，我們益加體認到包括國族認同在內的政治態度，其實是陸生對臺觀感這個連續光譜的一部份，考慮到陸生對政治議題的戒慎恐懼，它甚至是最幽微的一部分。而且其實在陸生難以精確回想具體社會接觸的情況下，他們在對臺經濟、社會與媒體觀感上的總評正好反映了其社會接觸的質與量，從而讓本研究得以初步判斷其社會接觸與政治態度的關聯性。我們認為陸生在臺日積月累的社會接觸和觀感是難以割裂的整體，從這個脈絡中提取其政治態度會更有意義，因此無論在執行焦點團體或呈現研究結果時我們都將它們融接在一起。

在兩岸人民從過去到未來的漫長交流裡，太陽花學運可能終究是個滄海一粟的事件，在此我們只是利用它當「放大鏡」來折射陸生對臺觀感「光譜」裡那幽微的政治態度片段。本研究中，太陽花學運不被視為扭轉來臺陸生政治態度的決定性動力，這個學運或許在它被當作新聞議題的大陸能這樣影響當地民眾，但我們相信它在來臺陸生心裡只是數不清的在臺經驗中的又一個驚嘆號罷了。

參、研究方法

一、詮釋現象學與焦點團體法

為探討陸生親身參與或透過媒體了解太陽花學運事件的經驗感受，並進一步探究其內心的政治啟示，我們乃以詮釋現象學（hermeneutic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為研究取徑，希望能透過導引陸生暢談相關議題而理解其所知所感。不同於量化方法論對研究對象保持距離的漠然態度，詮釋現象學認為個人是在自我的生活經驗中不斷流動，這些經驗必定能藉由語言、自我感受、個人直覺、意志或心情抒發出來（高淑清，2008：57-58）。因此，研究者要準備的是一個具備開放性（openness）的訪談環境，讓所有受訪者能在彈性的時空中反覆與自我生活經驗「再對話」

(re-encounter)，從而不僅能說出對當下生活經驗的感受，還能適當地反思過去的經驗、並從中找出特殊的意義（Van Manen, 1990）。

方法論學者 Sacks（1992）認為，詮釋現象學的優勢在於能透過自然情境下的互動與對話來蒐集主觀觀點，再藉由客觀的詮釋來解構這些觀點，從而得以更深刻地理解社會現象或被觀察者的心理變化。本研究就是遵循詮釋現象學派的方法論原則，透過團體互動來蒐集和詮釋陸生的觀點。果然在這種詮釋互動下，參與者為原始主題帶來了豐富而多元的意見，並在團體互動中確認了研究者詮釋的有效性。

詮釋現象學鼓勵研究者採用各種彈性的方式或技巧蒐集研究對象的生活經驗。本研究之所以選擇以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進行資料蒐集，是想讓有同儕相伴的陸生比較容易打開心防討論政治相關話題；這樣不但讓他們自由交流本身的生活經驗，還能夠使他們透過理解他人的經驗而修正或解構其原有的經驗意義。焦點團體法還可以大量蒐集參與者的對話資料，並觀察到參與者對議題的原始態度、堅持，以及認知調整，藉此深入探討生活經驗的背後意義（Patton, 1990: 335-336）。

本研究在每場焦點團體座談前會提示參與陸生回想太陽花學運，再輔以當時的新聞資料以重建學運的脈絡氛圍，並委請一名碩士班陸生負責補充提問與文字紀錄，也藉此緩解參加者們的隔閡感。焦點團體以開放式問答的方式進行，參與者都被鼓勵彼此自由地對話。待三場焦點團體結束後，筆者們乃對座談記錄之逐字稿進行整理，座談紀錄會被分為重建參與者意識的整體論述，以及特殊個案參與者的論述這兩個部份，最後再根據其中一再出現的重要議題進行意義梳理、參照、分析與詮釋。

二、座談參與者的挑選與其背景資料

本研究邀訪對象為來臺至少四個月的短期研修生、交換生或修讀學位的大學部與研究所陸生，由於本研究較希望邀請有親身參與過太陽花學運的陸生，為避免不熟悉此議題、不願討論此議題的人會影響座談進行，因此筆者們於 2014 年 4 月下旬起陸續詢問陸生參與太陽花學運的經驗，並徵

詢校內或任教班級中陸生受訪之意願，也委請已答應受訪的陸生以滾雪球方式再尋找其熟識且願意參與座談之陸生，最後在 5 月底確認三場焦點團體的參與陸生名單、舉辦時間與地點。每場座談均使用相同題目，包括參與太陽花學運的經驗感受、政治啟示、來臺後的人際或媒體接觸經驗對其政治態度之影響等問題。

本研究三場焦點團體之參與陸生共 20 位，包含 13 位女同學與 7 位男同學。以來臺時間區分，來臺待四個月以上的短期研修生有 9 位，待一年的交換生有 8 位，待超過一年的修讀學位生有 3 位。以學制區分，大學部學生有 12 位，碩士生有 8 位。以就讀科系區分，多數陸生以傳播與藝術相關科系為主，各舉辦地點即為該場次學生的就讀學校。另受訪者中曾在太陽花學運發生期間參與相關活動超過一天以上者（一天在現場至少須待超過三小時以上者）共有 11 位（請見表一）。雖然還有 9 位受訪陸生不算親身參與過學運，但是他們願意出席座談即顯示其對此事件之關心，而且他們也更能代表多數只透過媒體觀察這場學運的陸生，因此他們的看法對於我們的研究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表一：本研究執行焦點團體的基本資料

第一場					
2014 年 6 月 16 日（一）12:00—14:00 臺灣藝術大學					
代號	性別	級別	身份	科系	有無親身參與學運
A1	女	碩士班	短期研修生	民族學	無
A2	女	碩士班	短期研修生	表演藝術	有
A3	女	碩士班	短期研修生	戲劇	無
A4	男	碩士班	短期研修生	視覺傳達	有
A5	女	碩士班	短期研修生	藝術	無
A6	男	碩士班	短期研修生	表演藝術	無
第二場					
2014 年 6 月 17 日（二）12:00—14:00 銘傳大學					
代號	性別	級別	身份	科系	有無親身

參與學運					
B1	女	大三	交換生	傳播學： 廣播專長	有
B2	女	大三	交換生	傳播學： 廣播專長	無
B3	女	大三	交換生	傳播學： 主持專長	有
B4	男	大三	交換生	傳播學： 廣播專長	有
B5	女	大三	交換生	傳播學： 主持專長	無
B6	男	大三	交換生	傳播學： 主持專長	有
B7	男	大三	交換生	傳播學： 主持專長	有

第三場

2014 年 6 月 19 日（四）10:00—12:00 臺北教育大學

代號	性別	級別	身份	科系	有無親身 參與學運
C1	男	大三	短期研修生	語文與創作	無
C2	女	大三	短期研修生	語文與創作	有
C3	女	大三	短期研修生	自然科學教育	無
C4	女	大四	修讀學位生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	有
C5	女	大二	修讀學位生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	有
C6	女	碩士班	交換生	藝術與造型設計	無
C7	男	碩士班	修讀學位生	臺灣文化	有

資料來源：本研究

陸生的人際接觸和媒體接觸經驗是焦點團體中的重點蒐集資料。「人際接觸」包括在校園學習時與臺灣同學或老師之接觸經驗、結交臺灣友人或其他與人際互動相關之接觸經驗。「媒體接觸」則指陸生對臺灣新聞媒體的使用體驗。本研究從上述兩種社會接觸的角度出發，透過與陸生大量言語交流的焦點團體法，一方面梳理陸生在臺學習與生活的各種經驗感受，一方面也探討太陽花學運是否帶給陸生深層的政治反思與啟示。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在焦點團體座談前即已告知參與座談的陸生們此次主題將與太陽花學運和政治態度有關，為減少參與者在過程中的不安與言語保留，三場座談都以較輕鬆、容易引起共鳴的人際互動經驗，和對臺灣的整體觀感為展開討論的話題，接著再導入參與太陽花學運的感受與政治啟示等議題。本研究結果也將依討論順序分為「社會接觸對陸生對臺觀感之影響」，以及「太陽花學運帶給陸生的政治啟示」兩部分，並進而從三次座談紀錄詮釋歸納出觀察重點以資後續分析。

一、社會接觸對陸生對臺觀感之影響

（一）印象落差：對臺灣整體環境的期待失落

當問到陸生們「來到臺灣後感覺如何？」，他們對臺灣的感覺幾乎是負面與正面印象各佔一半。而最引起陸生共鳴的即是對臺灣「經濟環境」的印象落差。有位受訪陸生說：「在來臺灣前，大家都說臺灣人多有錢……，但下飛機後從桃園到臺北的路上，怎一路上都看到小平房，快到臺北了才看到有些高樓，這點令我第一印象就是失望的。……感覺離開臺北後就好像進入『先進農村』的感覺…整個說來臺灣好像沒有大家說的富裕！」(B5)

事實上有不少參與座談的陸生也表達上述看法，如有陸生說：「感覺臺灣民眾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富足，尤其電視上經常看到臺灣民眾抱怨經濟沒成長、找不到工作什麼的……確實臺灣的物價(學校附近)也沒有太貴……」(B3) 另外一位陸生說：「來到臺灣覺得什麼東西都很便宜，至少比起北京便宜。就我所知，臺灣經濟好像 20 年沒有成長，我感覺臺北與上海、北京其實落差很多。」(B1)

當問到來臺「人際接觸」的感想時，有幾位陸生均提到臺灣學生對兩岸經濟成長程度的認知偏差，例如有陸生說：「有臺灣同學問她『你們學校（大陸）有我們這裡（臺灣的學校）大嗎？』我回答她『我們那邊根本就是你們這好幾個信義區加起來差不多大……』。臺灣同學覺得學校已經很大了，她沒去過中國大陸，我們隨便一個小學都跟這差不多大！」（A5）也有陸生被臺灣學生問過「大陸人是不是都很貧窮」、「為什麼你們大陸人都很愛貪小便宜」（A3）、「你們房子有自己的廁所嗎」（B5），諸如此類的問題即使是在與臺灣同學的平日閒聊中也會不時發生，某種程度造成了陸生心中的不快，並降低陸生對臺灣學生的整體觀感。

有陸生就說：「被問到這些問題顯示臺灣學生的知識水準很貧乏，只是我們不會當著面說。」（B3）「感覺臺灣學生都是『道聽途說』，大陸現在的發展已經很不一樣了。」（A1）「有點覺得臺灣同學看不起中國大陸。」（B5）此現象也呼應過去文獻所提及，由於過去兩岸因政治因素長久處於分離狀況，致使臺灣媒體對大陸相關報導仍多存有偏見，負面新聞較多也影響民眾對中國大陸的整體印象。即便近幾年大陸經濟迅速發展，社會面貌已全然不同，但許多臺灣學生仍受制於媒體訊息與社會集體意識中所包藏的刻板印象。

被問到與臺灣學生的接觸感想，陸生普遍認為臺灣學生對他們還是「保持距離」。本研究亦曾詢問陸生：「會不會因為結交了臺灣同學或朋友而影響其對臺灣的整體觀感？」不同於先前文獻的結論，本研究發現多數陸生對此是持保留態度，如有位陸生說：「我不反駁（臺生的意見）並不代表認同，我只是不想說，但我內心還是有自己的想法。」（C1）

不少陸生也提及學習態度的差異，他們認為臺灣學生「愛打工勝過讀書，可以為了打工不來上課，這是在大陸不可能發生的」（C1），有陸生說：「臺灣學生上課態度很隨興，好像也都不準備，有時候我會想他們到底為什麼要來唸大學，學費不便宜……」（A5）也有陸生提到對臺灣學生的不同觀察，陸生說：「老實說他們（臺生）比我們（陸生）更有創意，但他們沒有自信，好像不知道自己的將來在哪裡。」（A1）還有陸生說：「我曾經

聽臺灣同學說，他們覺得臺灣已經很進步了。但我覺得他們是害怕知道真相，真相是臺灣經濟發展慢了些，競爭力可能已經不像以前那樣……」(B3)

值得注意的是，有陸生主動提到臺灣同學似乎很親日韓，比如熱愛日韓的產品和娛樂文化，但他們感覺太過親近日韓有些不好。有陸生說：「是不是因為臺灣被日本殖民過？日本行銷走軟性策略，但大陸就不來這套。」(A4)「之前廈門還發起抗日遊行、拒買日貨活動，我們都有去參加；來臺灣看到到處都賣日本貨，連 7-ELEVEN 都有…這是很奇怪的事，我不會買。」(B5)「我有問過臺灣同學為什麼喜歡日本？臺灣同學說了很多日本的好處。我感覺他們與我們對於過去那段歷史的感受差異太大，我們對日本殘害中國人的感受很深。」(B3)

總地來說，陸生還是相當程度地表達了對臺灣生活與學習環境的肯定，如同過去相關研究結論所指出的，陸生認同臺灣人情味較濃、社會福利好、法規制度完整等等。但本研究也發現陸生透過社會接觸所感受到的臺灣並非樣樣都好，尤其對於兩岸經濟發展、臺生學習態度，甚至是對日韓文化的接受度等等，都與來臺灣前的想像產生落差而引起失落。

(二) 無限自由=失控邊緣？

當詢問陸生對於「自由民主環境」的感受，參與座談的陸生普遍都能認同與肯定臺灣的自由民主環境，而感受較深刻的多半是來自校園的開放式學習風氣。例如有陸生說：「第一次跟臺灣同學出去拍片，一起討論、分享各自的想法，感覺沒有什麼不能講。這真的很好，不像在大陸很多東西是不能講的，包括跟同學討論也是。」(A3)還有陸生提到「跟臺灣老師學習也很自由，因為老師像朋友一樣，跟同學打成一片，不像大陸老師比較像『領導』」(A2)；也有陸生說：「在大陸，老師會說『這是大人的問題，學生不需要理解』；但在臺灣，老師會問我們『你們的看法是什麼』，給我們說話的機會，這種自由感不需解釋。」(A4)

若是在把自由適用的範圍擴及到社會國家，再問陸生如何看待臺灣社會的自由風氣，有陸生說：「我採訪過非營利組織，我發現臺灣這樣的公益組織非常多，各式各樣的、自發成立的，它們關注弱勢，臺灣政府也很重

視。這跟大陸很不一樣，沒有政府許可不可能成立這樣的關懷弱勢的組織。」

(B1) 令陸生感受深刻的還有「言論自由」，有陸生提到「臺灣媒體言論自由到令我吃驚的程度，什麼都可以談，法輪功、六四、好的、壞的，什麼都可以說，而且大家好像站在馬路上都可以討論」(B6)；還有陸生說：「(在大陸)很多事情我雖然有想法，但我不一定會說；在臺灣這兒，你有什麼想法都可以自由表達。這是需要學習的，至少對我來說，我是花了點時間在學習自由表達。」(B4)「令我驚訝的是，打開電視，大家都在罵領導、罵政府，我們只有在網路上說，電視上罵的話可能不行。」(B3)「會有學運我也不意外，臺灣人民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民眾與政府的衝突是可以理解的。」(C1)

然而，即便對臺灣社會自由風氣抱持高度肯定，部分陸生也提出了另類的觀察和解讀。有陸生說：「臺灣太自由也不好，自由過頭就會瀕臨失控，學運就是，政府好像沒能力、管不了，但多數人還要生活，那些多數人的自由怎麼辦？誰來照顧他們的自由？」(C1)「反正自由一喊出來大家都要尊重了，是不是什麼都要自由？什麼都需要釋放？那法治呢？」(C4)「我覺得臺灣人現在好像得了一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³到底什麼行為是對的？捷運殺人犯也有人支持他，⁴網路上還有人說要追隨他，這也是自由嗎？」(A4)不少陸生也指出他們雖然能充分感受到臺灣的社會自由，但也質疑若沒有法治原則並行，自由是否將導致社會失序？價值偏差？甚至自由本身也已經「質變走味」(A5)？

(三) 「新聞報導」不等於「真實報導」？

過去有研究指出(王嘉州，2012a：107)，陸生閱讀網路兩岸新聞的頻率越高，其對於兩岸統一的態度會越趨近「盡快統一」。參與本研究座談的陸生則幾乎一致表示，即使大量使用臺灣媒體也不會影響他們對統一的態度，亦即對自己政治立場的堅定性很有信心；這可能也與多數參與座談者來自傳播科系有關，因為他們深信不會被自己所熟悉的新聞傳播技巧所牽

³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又稱為人質情結、人質綜合症，是指犯罪事件中的被害者對加害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加害者的一種情結。

⁴ 此受訪陸生所指為2014年5月21日的臺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

引。本研究還發現多數陸生在臺期間仍是以使用大陸新聞媒體為主。

陸生使用頻率最高的臺灣媒體內容是新聞網站的文章，其次是電視新聞的網路影片；幾乎沒有同學會看紙本的臺灣報紙或雜誌，也沒有同學會收聽廣播。問及陸生對臺灣新聞內容的觀感時，多數都是持負面評價。有陸生說：「一開始我還蠻常看臺灣新聞，後來幾乎不看了，不習慣看不到『重點』的新聞，內容太瑣碎了。」(C4)「臺灣新聞報得很誇張。太陽花學運的時候我們看到新聞說有衝突，下午馬上衝到現場看，結果發現根本很平靜，……這真地讓我們對臺灣新聞媒體『刮目相看』！」(C1)「臺灣新聞感覺上內容很豐富，但娛樂新聞多，網路上的新聞好像也不用查證，渲染誇張的成分多。新聞報導難道不用負責任？」(B4)「老實說我不是很相信臺灣媒體報導的內容，不夠真實，很難讓人信任，我覺得這是臺灣過度開放與自由造成的問題，媒體不夠負責任。」(B3)

提到對臺灣新聞媒體的兩岸事務報導的觀感，陸生普遍也是持負面評價。有陸生說：「有臺灣同學問：『你們大陸人吃不起茶葉蛋嗎？新聞說你們每年能吃一顆水餃就很開心？』⁵這是很離譜的事！報導內容有偏差，讓臺灣人誤解了。」(A4)「很令人生氣的是，明明是湖南鄉下的一個家暴案件，記者卻寫得好像全大陸的媽媽都會打小孩，到處都有家暴，以偏概全！不把事實描述清楚是很糟糕的。」(A5)「臺灣有些媒體會刻意選擇對大陸形象不利的訊息來報導，尤其太陽花學運的時候，都扭曲事實，所以我們幾乎不看臺灣新聞，會讓人生氣。」(B4) 另也有陸生提出他對臺灣新聞報導的疑問：「為什麼臺灣不播國際新聞？」(B6)「臺灣新聞媒體是否沒人管理？我曾因為做作業觀察兩家電視新聞臺，同一天同一則新聞但內容卻不一樣，民眾會搞不清楚到底誰說的對。」(B1)「在大陸，媒體報導說不定沒人相信，因為官方只讓你看到它要你看的；但在臺灣呢？媒體報導也不能相信。」(C1)

整體來說，陸生們接觸臺灣媒體的親身經驗多與外界批判媒體亂象的角度類似。本研究發現，在臺灣待的時間較長的陸生因為使用臺灣媒體的機會較多，不但對報導內容產生更大的質疑，對臺灣新聞媒體的評價也更

⁵ 對「茶葉蛋新聞報導」提出批評的還有 C1、B4、B5 同學。

負面，例如就有陸生形容「越看越不想看」(B3)。相對來說，待不到一年的交換生對於臺灣新聞媒體報導的評價則未必都是負面的，例如就有陸生覺得「(臺灣的新聞)很新奇、很新鮮，沒想到新聞也可以用這種花俏的方式報導」(C3)。

二、太陽花學運帶給陸生的政治啟示

(一) 認知競爭：深刻體會兩岸政治定位的衝突矛盾

如同過去研究文獻所指出的，陸生多半能從平日的接觸經驗中感受到兩岸人民在政治認同上存有歧見(王嘉州，2012a：107-108；李佩雯，2014：147)。本研究發現在歷經太陽花學運事件後，更加深了陸生心中對兩岸政治定位的矛盾衝突。他們親身參與、見證了這場學運，使得他們逐漸明白兩岸在政治上始終無法取得共識的原因，並帶著矛盾情緒開始思考「兩岸可能不會統一」的景象。

有位參與現場活動的陸生說：「我在現場聽了很多演講，我一直在想，他們說的『我國』到底是哪國？從小到大我一直覺得臺灣就是中國的，但我發現在現場的人絕對不是這樣想的，他們講的、想的『我國』、臺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跟中國不一樣了，而且我覺得要去改變他們是有極大困難的。」(B5)「參與這活動讓我蠻失落的，我跟臺灣學生就坐一起，但我們卻對國家認同有很大距離，他們希望我們也認同把臺灣當成一個國家；事實上，不需要我們的認同，我看臺灣人早就把臺灣當成一個自成獨立系統的國家了。」(C2)「『我是臺灣人，臺灣主權不容許分割，臺灣人要自救』這些口號一直在我腦海裡，我很佩服臺灣人團結，但這會不會傷害了兩岸統一的希望？」(A1)本研究觀察發現，陸生從現場活動中不僅體會到兩岸對於國家定位存有歧見，還意識到臺灣對中國大陸的崛起產生恐懼，有陸生就說：「為什麼臺灣學生不思考怎樣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反倒怕中國大陸的威脅？難道怕自己有一天變成中國人？」(A5)此番話立即引起現場另外一位座談學生的回應：「難道現在不是中國人嗎？那是什麼人？」(A6)隨後「目前臺灣人是不是中國人」開始引起座談陸生的激烈爭論，似乎也應證了本研究之觀察：在陸生們的心中也開始對兩岸的政治定位產

生矛盾的認識。

有陸生問筆者們：「接下來兩岸會怎麼走？我感覺臺灣學生對大陸都沒有認同感，或許他們的爺爺奶奶還會對大陸有感情，但大學生、年青人已經沒有了，以後怎麼談（統一）？」（C5）另有陸生說：「我與臺灣同學一起做作業時他說『我們臺灣如何如何，你們大陸如何如何』，我到現在還不能認同這樣的說法。」（C2）「我覺得從老師到同學都是一樣的認知，例如老師上課會說『我們國內的規定是……』，『國內』是指臺灣，臺灣同學也都這樣講，我不會去糾正，聽久了也習慣了。」（A2）有陸生說：「還沒來臺灣之前我分得很清楚，……我認為臺灣人、香港人都是中國人。但來臺灣後聽多了以『臺灣』為主體的發語詞，好像也習慣了，像現在我也會說『你們臺灣如何如何、你們臺灣的水果如何如何』，心中的那條線好像有點模糊。」（B5）

談到對兩岸統一態度的變化，有陸生說：「以前我沒有想過兩岸什麼時候要統一；我認為這是一個目標、一個理想。但從太陽花學運後我覺得這根本就是夢想，難上加難。」（A6）有陸生說：「原本還覺得兩岸統一點點希望，現在覺得根本無法預期，可能在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吧！」（A4）事實上不少陸生都有像上述的態度變化，對於兩岸統一的態度從很期待、很迫切、很重要，或是「終究要統一」的想法，轉變為消極的、無法預期的，或不再期待的。有陸生說：「以前聽說兩岸未定論時我內心是很激動的，我認為兩岸終須走在一起，但現在再問我兩岸未定論，我內心的激動已經不見了。」（B6）陸生普遍體認到兩岸對國家認同、政治定位的立場歧異，而對於兩岸官方能在這方面做什麼努力也不具信心，有陸生直言：「兩岸經濟、文化、與社會發展方向的差距越來越大，彼此鴻溝只會越來越深，這對將來兩岸和平關係可能都會有影響。」（C5）還有陸生甚至認為將來兩岸無需進行政治談判，「沒有認同感，怎麼談？這結果也一定是讓人失望的」（A1）。

（二）換位思考：從認知到認同的心理說服

「認同」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概念，學者發現尤其在理解彼此的差異後，不同群體會透過有效的跨群體協商來重構彼此的認同（Hall, 1990）。部分

探討陸生的研究也提到此「認同重構」的變化，亦即陸生與臺生在互動過程中了解彼此的社會文化背景發展，嘗試以同理心認同彼此的價值觀、態度與信念（胡紹嘉，2012；柯曉翔，2011）。本研究也有類似發現，陸生在臺期間透過各種社會接觸而反覆進行自我說服，多數陸生都認為待在臺灣的時間越久，這樣的心理說服便越成功。有陸生說：「待了兩三年，我都會學臺灣人講話口音，他們都聽不出來我是陸生，心理上也覺得很融入這個社會。……好比我就覺得太陽花學運沒什麼不對，這是人民的聲音。」(C6)有陸生指出：「我內心是贊成這樣的活動的（太陽花學運），如果我是臺灣人，我會捐錢也會參加，政府確實要負責任。」(B5)「我能理解臺灣人為什麼要捍衛自己的主權，臺灣要團結，但兩岸也不能因此受到傷害。」(A5)

關於陸生對臺灣主權容忍度的變化，本研究也和既有文獻一樣發現部分陸生確實會因為社會接觸經驗（王嘉州，2011），使其對較為敏感的主權議題從「認知」階段轉向「部分認同」階段。例如有陸生說：「同宿舍的臺灣同學說『我國主權、我國權利』什麼的，我聽了非常反感，還跟同學辯論過。現在待久了、習慣了，也漸漸可以理解為什麼大家這樣說。」(A1)有陸生說：「現在容忍的範圍變大很多，比如臺灣電視節目、新聞報導，或是臺灣同學說『你們大陸、我們臺灣……』等等，我都可以接受；而兩國論、臺灣要加入聯合國什麼的，我覺得也都可以討論。」(A2)本研究也發現，陸生待在臺灣的時間越長，對於臺灣政治定位、主權議題的換位思考越為明顯，有陸生說：「大家的包容力都變大了，以前我聽到臺灣要獨立，我一定馬上支持快點用武力打下臺灣。現在不會了，我現在可以接受臺灣是一個獨立的島國，我也認可這裡的政治制度，而且為什麼一定要回歸大陸呢？」(B2)

在座談中也有部分參與太陽花學運的陸生對臺灣定位和主權有更深入的想法。有陸生說：「兩岸不只是政治問題，還有經濟、文化、歷史因素的糾結。……未來如果要統一，中國也要一個繁榮、進步向上的臺灣，武力攻臺絕對是不對的策略，要從彼此的角度去思考吧！」(B6)也有陸生認為：「臺灣人是在反服貿嗎？還是在反中國？大家就承認吧，現在這裡就是一個國家，而且兩岸一定要統一嗎？」(B3)對於上述言論，在場座談的

其他同學也立即回應：「我可以接受這裡獨立發展，有自己的政治體制、獨立的國旗、國號、國歌等，但這跟獨立是兩回事，難道不能一國兩制嗎？」（B5）另外也有陸生說：「你掛什麼旗子是你家的事，自己喜歡就好，言論分歧不一定是壞事。」（C1）

事實上無論是否參與太陽花學運，多數參與座談的陸生是對臺灣現狀抱持著「很難干預、也不必插手」的態度。如有陸生說：「其實臺灣獨立不獨立跟現在都一樣，對我們沒有影響。臺灣很好，大陸也很好，我覺得維持現狀對兩邊都有好處。」（B3）也有陸生表示，同樣說華語的兩岸互相幫助比較重要，就算大陸不接受臺獨也不能怎樣。儘管談到敏感的國族認同時，部分陸生堅定地表示不接受臺灣是主權國家的說法，但他們也承認其在臺的現實生活經驗確實顯示臺灣社會就像獨立政體般地運作，甚至進一步對於「臺灣是否屬於中國」的辯論也覺得沒有必要。筆者們有注意到，在臺灣待得越久、社會接觸越頻繁的陸生，越容易被激發同理心並且產生換位思考，因此對於敏感的統獨議題也更容易淡化處理。

（三）圖像複製：對民主自由制度的想像

先前有關陸生的研究較少探討陸生內心對於臺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感受與反思，基於想了解社會接觸或太陽花學運有無啟發陸生對自由民主制度的想像，或對中國大陸政治制度的反思，本研究也以此為題詢問參與座談的陸生。

本研究發現，即便陸生對於臺灣自由民主制度的運作結果仍有質疑，但對臺灣實踐了自由民主多表達肯定。有陸生說：「我們專制，所以我們普遍不相信政府，人們對政府是有恐懼的。臺灣民眾雖然也對政府的信任感很低，但不一樣的是，臺灣民眾如果覺得政府能力不夠，可以透過選舉換掉政府，我們就沒辦法了。」（B1）「有時候覺得臺灣太自由了，很亂，感覺不出法治在哪裡。但說實話我覺得臺灣政府治理能力很好，至少比大陸好，所有像是社會福利或是保險制度等等都很健全。」（B6）「臺灣政府也很親民，我曾經寫信給馬英九，他真地有回信，還有一張照片。不管是不是他本人回的，至少在大陸就不可能，寫信給政府一定是石沉大海的。」（C4）

部分參與過太陽花學運的陸生對於臺灣的自由民主體制有更深刻的體會。有陸生說：「一開始不明白，以為是在反中國。綠營人士講話很猖狂、也很偏激……後來理解學運是在反黑箱，……反政府資訊不透明。……大陸有更多事情資訊不透明，但我們根本無從得知。」(C3)「我的解讀是學運是大家一起幫助政府，指導政府如何把臺灣管理好，這就是民主吧！但大陸人多、意見多，政府好像也不用人民指導，可能連人民意見都聽不到。」(B3)有陸生說：「我到了現場兩次，高度民主化的素養讓我很震驚。不管在聽演講區或是發放食物、飲水和暖暖包的地方，都很有組織和秩序，我無法想像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大陸會是如何……不用講別的，有兩個大陸同學來學運現場拍攝放上網，結果馬上被我們官方調查……」(A4)「我自己的叔叔也曾經參與過大陸的學運，結果就被秋後算帳。我也替這些臺灣同學擔心會不會被政府秋後算帳？但臺灣同學都說『不可能』，他們相信臺灣政府不會這樣做。如果真地像他們說的不會被秋後算帳，這才是真正的自由社會、人民作主。」(C1)

當詢問此次太陽花學運有無帶給他們特別的政治啟發？有陸生說：「我很好奇為什麼大家這麼勇敢？可以站出來遊行、抗議政府？我父母原本叫我不要去，說會很危險，但我還是跟同學去了，到了遊行現場感受很強烈，看到這麼多人為了自己的未來站出來，我內心很激動，在大陸有可能嗎？比較起來，大陸的人權還是不足夠的。」(B5)有陸生說：「無論學運的手段是不是正確，但年輕人關心政治、投身民主運動，這就是民主國家，我也覺得這樣的社會才是進步的。」(C2)同場座談的陸生也說：「這場學運給我的啟發是：年輕人是需要民主的，我們需要一個可以說實話的地方，需要一個可以發表心中抱怨的地方。」(C5)

本研究發現，親身參與太陽花學運之後，部分陸生從一開始的怕被發現、怕遭到排擠，轉而從學運中感受和學習到民主價值，並逐漸去比較與反思大陸的制度現況。例如有陸生提到：「我覺得臺灣人有真實的『投票權』是很值得學習的，那是真地讓人民自己做選擇；而且我上網查過臺灣的『公投』，也是真地讓公民用投票表達意見，這很難得，在大陸根本是不可能的。」(C6)有陸生談到學運領袖時說：「大家想想如果今天林（飛帆）、陳（為

廷)兩人是在大陸,可能第二天就會消失不見。在臺灣則就好好的,天天上電視講他們的,不用怕政府。」(A4)另外也有陸生說:「大陸老師有勸導我們不要去參與學運、不要討論政治話題,但臺灣老師上課都在討論……。我們也從不講到開始討論,還有跟臺灣同學辯論的都有,為什麼不能說?」(A2)而同場座談的學生最後說了這段話:「即使我們嚮往,大陸現實的狀況就是不行。大陸行政區域大,如果給人們太多自由會很難管理,但是不是可以採取漸進式?感覺我們與民主制度還有點距離。」(A4)

(四) 調整底線:避免過度的政治認同與自我迷失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雖然從座談紀錄梳理出以上陸生對民主制度運作的觀察反思,但研究也同樣發現在陸生認同調適的過程中,會不時出現「踩煞車」的情況,亦即避免自己出現過度的政治認同而導致自我迷失。例如有陸生說:「過去我讀過『新興國家民主的倒退』的文章,國際上臺灣算是新興民主國家吧?那太陽花學運算不算是民主倒退?民主不見得都是往好的發展,這點臺灣政府也要小心。」(A6)也有陸生說:「我覺得臺灣現在有點『逢政府必反』。任何政策都要反對、都要人民作主的話,國家要如何發展?」(C4)有陸生回憶參與學運的過程說:「我曾經在現場聽到上臺演講的人說『雖然我不知道服貿的內容是什麼……』,還有人說『我不清楚大家真地在反對什麼,但是……』。即使我很支持學生表達自己的看法,但這樣的民主是很空虛無知的。」(B4)同場座談的另一位陸生也回應說:「我覺得學運對某些學生來說,根本不是學習,也不是抗議,只是一次又一次翹課的機會……」(B3)有陸生提出不同觀察:「民主是很美好的事,但絕對不是被牽著鼻子走。……誰鬧就聽誰說話嗎?那其他大多數民眾怎麼辦?……我覺得政府應該要保障全民,替所有民眾解決問題,不是為少數人服務。」(C1)

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在比較的過程中,雖然陸生會讚許臺灣民主自由,但也會適時回想起大陸制度的優點。例如有陸生說:「我覺得在大陸,人民的話語權好像更多一點,尤其在網上傳播出去是很巨大的力量;在臺灣好像是人民能說的太多了,所以說什麼都可以,也好像都不太重要。」(B6)有陸生說:「這幾年大陸其實也有自發性的抗議活動,是政府允許

的，比如廈門抵制日貨活動，政府不會阻攔你，只是媒體不見得都有報導。」（B4）也有陸生反問筆者們：「民主制度有固定模式嗎？我覺得大陸某種程度也有民主自由，至少我不會覺得不自由，跟我在臺灣好像沒有什麼差別。」（C5）同場座談的陸生也回應說：「很多人說大陸沒有人權，例如我們推行計畫生育，但換個角度想這是保障孩子的教育權利不是嗎？」（C4）同場的另外一名陸生也說：「還有網路管制，我們也不覺得網路管制不自由。臺灣沒管制就比較好嗎？這次的捷運殺人事件不就是網路暴力電玩玩太多而生病了嗎？我覺得有管制還是比較好。」（C1）

對於社會接觸理論能否消除異族歧見、促進族群融合至今仍有正反兩面不同主張。本研究發現陸生在適應臺灣民主政治文化的過程中，會同時出現兩種情緒：一方面認識臺灣民主制度的價值與文化、產生認同感；另一方面則會隨時比較與回想大陸政治制度的優點，並進行自我調整。陸生會合理化大陸的統治現況，而不是一味地認同臺灣的制度；也就是在認同他群長處的同時，也在鞏固我群優勢，以避免過度認同臺灣而落入自我迷失的困境。如同有陸生說：「雙方都有優點、也都有缺點，為什麼一定要說誰好、誰不好？說誰要學習誰？」（B7）

伍、結論與討論

2014年3月以大學生佔領立法院議場為開端的太陽花學運，不只讓全臺民眾留下深刻印象，也給了陸生親臨現場的難得機會，讓他們體驗前所未有的民主震撼教育。陸生們從來臺第一天開始所遭遇的文化衝擊，可以說在太陽花學運發生之際達到最高潮。一群與陸生年齡、身份相仿、幾乎同文同種、並被認為同屬「一國」的臺灣學生，竟做起了這些陸生完全想像不到的事情。在後六四時代出生和成長的大陸青年，早已習慣了被官方閹割學生運動權利的大陸校園生活，並且被教育成一群只信奉高速成長體制的經濟公民。但這場太陽花學運無論是遠因、近因、形式，與目的都徹底攪亂了陸生的許多觀念教條。

首先，這場以杯葛《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為「目的」的學運，讓陸生認識到原來臺灣民眾對經濟成長的執著遠不如大陸民眾，他們開始意識到徒有經濟讓利不足以「買通」臺灣民心。其次，這場以學生佔領議會、社會力量持續支援為「形式」的體制外反政府活動，讓陸生看到了臺灣民主精神的深化，以及臺灣當局對反對力量的理性尊重。太陽花學運的「近因」是執政黨立委僅用 30 秒就草率宣布完成服貿協議的審查，無論「反黑箱」的訴求是否只是該學運的一項修辭，但這項訴求已經在部分有洞見的陸生心中揭示了臺灣的民主價值：決策透明、權責相符，和公民參與。最後，一些敏銳的陸生必然也已明瞭，太陽花學運的「遠因」乃是部分臺灣民意對兩岸統合的強烈抗拒，這想必也撼動了陸生從小根深蒂固的「一個中國」認知。

本研究透過焦點團體法蒐集資料，試圖梳理出跨文化的社會接觸如何影響陸生的對臺觀感，以及太陽花學運帶給陸生什麼政治啟示。在整理和檢閱相關文獻後可知，至今多數針對來臺陸生的研究多採用問卷調查法，或者是問卷調查為主、訪談為輔的方法（柯曉翔，2011；王嘉州，2012a；藍振弘，2013），其研究結果通常只單純回應了問卷或訪談的個別題目，較難捕捉陸生心理的複雜動態。本研究本於好奇大陸青年民主思緒如何在臺灣有機生成，特藉由太陽花學運此一重大新聞事件為引子，讓有或沒有親身參與這場學運的陸生同儕都在焦點團體法所建立的開放論壇中自由對話，一方面減緩陸生對討論政治性議題的排拒感，二方面也營造鼓勵多元觀點的論述空間。實際應用後我們發現，即使話題敏感，焦點團體法確實能收集到大量陸生的發言，正如詮釋現象學所應許的，本研究所獲致的資料有力地釐清了研究問題，深刻地描寫了陸生在跨文化社會接觸、對臺經濟、社會、與媒體觀感，以及包括國族認同等複雜政治態度之間所浮現的豐滿面貌。

在研究結果的第一部份，我們歸納出了三種主要影響：一、陸生在抵達臺灣後普遍對於臺灣的「經濟發展程度」產生較嚴重的期待落差，而臺灣同學或老師對大陸的刻板印象又使陸生對臺灣萌生負面觀感，陸生們也反應較不會因為結交臺灣同學或朋友而改變他們對臺灣的整體印象。二、對臺灣校園的自由學習環境以及臺灣社會的民主開放風氣，諸如人民有集

會結社與言論的自由等，多數陸生皆給予高度肯定。不過也有陸生持不同看法，例如有人認為臺灣可能已經過度自由而罔顧法治，因此容易造成社會失序，甚至是人們觀念的扭曲。三、詢問陸生接觸臺灣新聞媒體的觀感和影響後，本研究發現陸生對臺灣媒體的評價偏向負面，尤其認為臺灣的新聞報導普遍對陸客和大陸事務採取不友善的角度，這不僅容易造成臺灣民眾誤會，也讓陸生對臺灣媒體頗為反感，並時常將臺媒貼上「不可信任」的標籤。

在研究結果的第二部分，我們發現太陽花學運對於陸生產生的政治啟示如下：一、陸生多從社會接觸中明顯感受到臺灣民眾，特別是青年學子，在兩岸政治定位的認知上和自己南轅北轍。本研究發現陸生在參與或經歷太陽花學運後，更加深了他們心中對兩岸政治定位認知的矛盾衝突。簡言之，這些陸生已經開始能理解為何兩岸始終無法取得政治共識的原因，但接下來又必須面對現實問題，亦即兩岸可能不會統一的發展趨勢。二、多數陸生都認為待在臺灣的時間越久，心理說服便越成功。陸生對臺灣普遍的價值觀、對兩岸定位的政治態度，以及對臺灣主權的容忍度，都會受到停留臺灣時間的長短所影響。三、即便對臺灣自由民主制度的運作現況仍略有質疑，但多數陸生對臺灣實踐了自由民主仍然表示肯定，同時部分參與太陽花學運的陸生也會開始比較與反思中國大陸的制度現況，甚至想像中國大陸的民主願景。四、儘管陸生對臺灣政治民主和社會自由有推崇、也有批評，但同時也會存在兩種情緒：一方面是對臺灣的民主價值與文化產生認同感；另一方面則會不時回想起祖國制度的相對優點，以適度平衡暫時失調的自我認知，而不是一味地認同臺灣式的價值。簡言之，陸生在認同他群長處的同時，也會鞏固我群的優勢，以避免過度認同而產生自我迷失。

本研究的結果對照既有文獻也有一些有趣的發現。不少西方的研究指出結交異族朋友會明顯降低對於異族的負面印象（Power & Ellison, 1995；Hamberger & Hewstone, 1997；Pettigrew, 1998）。但是陸生們在座談中卻普遍反應比較不會因為結交臺灣朋友而改變對臺灣或臺灣人的整體印象。這可能是因為在一群陸生對談的環境下人們比較不好意思承認自己的客觀認

知會因為新朋友而變動，抑或他們甚至沒發現自己其實有這種傾向；另一項可能為友誼其實是較少負面印象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亦即人們是因為本來就對某族群比較友善才願意去結交朋友。對照華人的相關文獻（楊開煌、劉祥得，2011；章英華，2011；蔡明璋，2011；張翰壁、張晉芬，2013），本研究同樣發現頻繁的社會接觸有助於陸生改善對臺灣文化與社會的印象，並傾向認同臺灣的民主生活。但是透過對受訪者大量對話的詮釋分析，我們也捕捉到陸生固有意識形態的拉力在價值觀競爭的過程中如何作用，這也能或多或少地解釋那些質疑陸生認同轉變的研究結果（王甫昌，2003；陳志柔、于德林，2005；耿曙、曾于綦，2010；李佩雯，2014）。

本研究歸結了多數參與座談者的心路歷程後發現，來臺後頻繁的人際溝通與跨文化傳播逐漸改變了陸生對臺灣的原始期待，並形成了更具體的對臺觀感，而這些觀感經過太陽花學運的催化或引爆後，又孕育出了上述的政治態度。在焦點團體的過程中，筆者們可以充分感受到臺灣人自詡的經濟優勢對陸生已不具號召力。臺灣或許在城鄉均富發展上比大陸成熟，但是陸生多半認為臺灣城鄉基礎建設的外觀並不如近年高速發展的京、滬等大城，而臺灣民眾卻又普遍有大陸很貧苦的認知，這荒謬並存的兩件事顯然令陸生很不平衡。本研究認為，臺灣現在能讓陸生欽羨的成就已經從經濟表現轉移到更深層的面向。比方說，雖然參與座談的陸生頻繁表示看不慣臺灣「亂烘烘」的大眾媒體和網路傳播，但不少人也敏銳地察覺這些現象乃立基於大陸還可望不可及的價值前提：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誠然，要陸生在焦點團體中承認自己是會受媒體或朋友而改變政治立場的人並不容易，甚至他們自己也不一定能察覺這種改變是否正在發生；但是他們與臺生之間的同窗關係畢竟屬於 Allport 所分類之「實質性社會接觸」，長此以往的影響力是值得期待的。其實在進行座談和整理記錄的過程中，筆者們已發現對臺灣較深刻的好評多半來自在臺時間較長的陸生；可見隨著社會接觸的遞增，一些需要仔細體會才能察覺的兩岸差異是會浮現在陸生心中的，一些臺灣在政治、社會，與文化上長久累積的制度優勢是會打動陸生的。這種潛移默化的效果在太陽花學運爆發時做了一次總驗收：來臺時間較長、社會接觸夠多的陸生見證了臺灣社會對各種聲音（包括反政府）的包容力，坐實了他們來臺期間對此間體制的正面想像；即使

臺灣的政治民主或新聞自由可能還不成熟，但經歷過這場學運的陸生都相信臺灣人是「玩真的」、這裡是第一個真心要實現「人民作主」的華人政體。另一方面，來臺時間越短、社會接觸越少或越偏「偶發性」的陸生則更像一般大陸民眾，容易只看到太陽花學運裡的「仇中」意識（雖然它確實存在），並在民族主義的召喚下陷入門戶之爭，反過來主張中共集權體制表面上的相對優勢，並強化自己的我群認同。

在研究侷限上，礙於筆者們時間與能力所限，僅能針對北部三所學校的陸生進行座談；且由於聯絡時間不足，參與座談的人數較少，致使研究無法更細緻地比較和討論短期研修生、大學生，與碩士生之間的差異。此外，焦點團體執行時常常會出現意見領袖，日後的研究或許也可以此作為新的觀察角度，從而探討陸生團體中不同立場者競逐其主張的情況。儘管筆者們在主持焦點團體時不斷以辯證式的反詰來誘發眾聲喧嘩的交流，但畢竟來臺陸生在部分場次同質性太高（科系或交流身份）以致於意見可能流於狹隘。本研究方法的其他缺點還有因不用隨機樣本而造成的有限代表性，所以我們難以確知本研究結果能多大程度地反映所有來臺陸生的情況。最後，詮釋現象學雖然善用對話來增進研究者詮釋的準確度，但對於許多陸生的發言，兩位臺灣的研究者仍難脫離臺灣的本位來思考和演繹，因此研究結果不可否認地仍帶有相當的主觀性，日後或許可以邀請大陸學者參與類似研究來改善這個問題。

在 1949 年兩岸分治之後，其實就開展了一場兩種華人政權的制度競爭。在兩岸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的今日，這超過一甲子的競爭成果都在往來的兩岸人民心中打下一張張的成績單。從這個角度來講，開放陸生來臺是兩岸交流極為重要的里程碑。這些意識形態較為青澀的年輕學子更能用客觀的所見所聞來形塑自己的對臺觀感，以及對兩岸制度的評比；而帶著這些新思維回到家鄉的陸生，又有潛力成為大陸各行各業未來的中堅份子或意見領袖，因此陸生的在臺體驗必將成為兩岸長遠關係的重要變因，執政者不可不慎。本研究認為太陽花學運拉近了社會接觸較深的陸生對臺灣體制的認同，卻也強化了社會接觸較淺的陸生對大陸體制的堅持。臺獨分離主義在臺灣這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中是必然存在的一種意識形態選

項，就像臺灣體制所保障的所有政治主張一樣，只有當陸生在臺時間夠長，才比較可能從只注意表面的仇中氛圍，轉而察覺臺灣社會深層的制度性包容和多元化價值。

根據本研究執行的經驗和發現的成果，我們認為臺灣社會與民眾對於陸生來臺求學、甚至更廣泛的兩岸民眾交流都應該抱持開闊的心胸，但與此同時也不應懷有「和平演變」、「用夏變夷」這些不切實際的想法。我們鼓勵臺灣本地的師生或一般人以最平實的心態不卑不亢地接待這些對岸的友人；就像對待其他境外人士一樣，讓他們融入臺灣社會的最好方法就是像對待臺灣人一樣對待他們。呼應 Al Ramiah 與 Hewstone（2013）對妥善設計社會接觸環境的呼籲，本研究也期許政府對陸生在臺生活或工作的規定能更加公平，以利他們能更平等且深入地與本地人相處。我們相信摒除敵意和歧視的真誠互動，絕對是臺灣人能給這些青年帶回大陸的最好禮物。

我們不建議主動對陸生談起政治議題，但若被好奇的陸生問及，客觀地呈現我國的憲政原貌、臺人的統獨傾向與國際的政治實況，或許是最好的應對。由於在大陸的學校中和媒體上罕有實事求是地面對民主政治和兩岸關係，陸生來臺後若主動索求這樣的機會，臺灣的教師有責任幫助他們補足這個知識缺角。有鑑於在大陸相關議題總是被情緒性或規範性的論述淹沒，在臺灣的我們不如就省了這個部分，改以描述性的事實來啟發陸生更廣泛的思考角度。我們相信這些陸生來臺期間被埋下的智識種子需要時間來健康長大，但一旦成熟後其影響力就絕非速效的民族激情或表面的政治口號所能比。

任何人都恐懼迷失自我，在大陸城市人生活水準逐漸追上臺灣之際，要來臺陸生馬上認同臺灣的體制優勢，並檢討大陸的相應問題是不可能的。本研究就發現，短期來臺的交換生更可能因為較多的「偶發性社會接觸」而加深成見，特別是在發生類似太陽花學運的政治事件之際。因此本研究建議那些期許陸生成為未來大陸政治改革催化劑的臺灣執政者，應該鼓勵更多陸生來臺長期就學，為他們製造更多「實質性社會接觸」的機會，使其得以深刻地體會臺灣政治與社會文化的真實脈絡，如此他們未來成為「知臺派」、或甚至「親臺派」的願景必將水到渠成。

參考書目

- 小可 (2014.04.01)。〈一位陸生的學運觀察日記〉，上網日期：2014 年 5 月 10 日，取自「牆外樓」<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68430>
- 王甫昌 (2003)。《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
- 王嘉州 (2010.11)。〈政治社會化對來臺陸生政府認同之影響〉，「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成長團活動研討會」論文。臺灣，臺北。
- 王嘉州 (2011)。〈來臺陸生的政治態度與臺灣主權接受程度〉，《臺灣政治學刊》，15 (2)：67-113。
- 王嘉州 (2012a)。〈來臺陸生統一態度變遷初探：政治社會化途徑與定群追蹤法之分析〉，《臺灣民主季刊》，9 (3)：85-118。
- 王嘉州 (2012b)。〈赴陸交流對臺灣學生統一意願之影響〉，《社會科學論叢》，6 (2)：1-34。
- 伊慶春、章英 (2006)。〈對娶外籍與大陸媳婦的態度：社會接觸的重要性〉，《臺灣社會學》，12：191-232。
- 李佩雯 (2014)。〈我群與他群：兩岸學生社會認同差異之跨群體溝通研究〉，《傳播研究與實踐》，4 (1)：129-171。
- 李樑堅、李銘義、顏志榮、趙文彬 (2013)。〈開放陸生來臺就學之面對問題〉，《教育行政論壇》，5 (2)：47-78。
- 林家正 (2011)。《大陸學生來臺交換就讀滿意度之研究：以臺灣大學與義守大學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胡紹嘉 (2012)。〈旅歷臺灣，返響中國：一位來臺陸生的跨文化敘事研究與認同重構〉，《新聞學研究》，111：43-87。
- 柯曉翔 (2011)。《跨海公民課：大陸交換學生的臺灣經驗》。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耿曙、曾于綦 (2010)。〈中共邀訪臺灣青年政策的政治影響〉，《問題與研究》，49 (3)：29-70。
- 高淑清 (2008)。《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揚帆再訪之旅》。臺北：麗文文化。
- 章英華、伊慶春 (2006)。〈社會距離態度反映的族群關係：臺灣資料再探〉，劉兆佳、傅仰止 (編)《社會發展的趨勢與挑戰：香港與臺灣的經驗》，

- 頁 341-369。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 章英華（2011）。〈社會偏見或社會距離：就臺灣原住民與漢人間社會距離態度的討論〉，蕭新煌、尹寶珊、王家英（編）《解讀臺灣社會意向》，頁 161-18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 張翰壁、張晉芬（2013）。〈全球化效果的侷限：臺灣民眾對接納跨國移民的態度〉，《臺灣社會學刊》，52：131-167。
- 陳志柔、于德林（2005）。〈臺灣民眾對外來配偶移民政策的態度〉，《臺灣社會學》，10：95-148。
- 陳怡如、余元傑（2014）。〈初探來臺陸生之事會支持與生活因應方式：以私立科技大學為例〉，《學校行政雙月刊》，92：65-84。
- 傅仰止（2001）。〈臺灣原住民優惠政策的支持與抗拒：比較原漢立場〉，《臺灣社會學刊》，25：55-109。
- 楊開煌、劉祥得（2011）。〈社會接觸及政治態度影響臺灣民眾對大陸印象、認知、政策評估之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12（3）：45-94。
- 蔡明璋（2011）。〈從接觸到接受？婚姻移民支持態度的再檢視〉，《研究臺灣》，7：1-23。
- 蔡翠旭、林翠蓉、陳怡珮、程伊昉（2012）。〈大陸學生在臺灣生活適應與學習滿意度之研究〉，《華人前瞻研究》，8（2）：15-42。
- 藍佩嘉、吳依凡（2011）。〈在「祖國」與「外國」之間：旅中臺生的認同與畫界〉，《臺灣社會學》，22：1-57。
- 藍振弘（2013）。《來臺陸生的國族想像與對臺觀感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碩士論文。
- 龔儀、江滿堂、黃俊維（2015）。〈屏東教育大學陸生來臺學習意見之研究〉，《學校行政雙月刊》，98：115-132。
- Al Ramiah, A., & Hewstone, M. (2013). Intergroup contact as a tool for reducing, resolving, and preventing intergroup conflict: Evidence, limitations, and potential. *American Psychologist*, 68(7), 527-542.
- Allport, G. W. (195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Cambridge, MA: Addison-Wesley.
- Aronson, E., & Patnoe, S. (1997). *The jigsaw classroom*. New York: Longman.
- Bogardus, E. S. (1926). Mutations of social distanc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10, 77-84.

- Chao, C. (2003). Will 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lead to a congenial political culture? *Asian Survey*, 43(2), 280-340.
- Cook, S. W. (1978). Interpersonal and attitudinal outcomes in cooperating interracial groups.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2, 97-113.
- Dixon, J., Durrheim, K., Tredoux, C. G., Tropp, L. R., Clack, B., Eaton, L., & Quayle, M. (2010). Challenging the stubborn core of opposition to equality: Racial contact and policy attitudes. *Political Psychology*, 31(6), 831-855.
- Grothé, J. P. (1970). *Attitude change of American tourists in the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 Hall, 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pp. 222-237). London, UK: Lawrence & Wishart.
- Hamberger, J. & Hewstone, M. (1997). Inter-ethnic contact as a predictor of blatant and subtle prejudice: Tests of a model in four west European n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2), 173-190.
- Hewstone, M., & Brown, R. (1986). Contact is not enough: An intergroup perspective on the 'contact hypothesis'. In M. Hewstone & R. Brown (Eds.), *Contact and conflict in intergroup encounters: Social psychology and society* (pp. 1-44).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Hodson, G., Busseri, M. A. (2012). Bright minds and dark attitudes: Lower cognitive ability predicts greater prejudice through right-wing ideology and low intergroup contac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2), 187-195.
- Jackman, M. R. & Crane, M. (1986).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black...': Interracial friendship and whites' racial attitud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0(4), 459-486.
- Keng, S. (2007).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owar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32, 63-80.
- Kim, Y. Y. (2002). Adapting to an unfamiliar cul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overview. In W. B. Gudykunst & B. Mody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p. 259-273). Thousand Oaks, CA: Sage.

Patton, M. Q.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Sage.

Pettigrew, T. F. (1998).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9, 65-85.

Powers, D. A. & Ellison, C. G. (1995). Interracial contact and black racial attitudes: The contact hypothesis and selectivity bias. *Social Forces*, 74, 205-226.

Sacks, H. (1992).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Oxford: Blackwell.

Stephan, W. G. & Stephan, C. W. (1984). The role of ignorance in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N. Miller & M. B. Brewer (Eds.), *Groups in contact: The psychology of desegregation* (pp. 229-256).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Triandis, H. C. (1994). *Culture and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McGraw-Hill.

Van Manen, M. (1990).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s: Human science for an action sensitive pedagog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he Feelings about Taiwan and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of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Extracted from the Conversations after Sunflower Movement

Wen-ting Shan 、 Cho-wen Chu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feelings about and political attitude toward Taiwan after their extensive intercultural social contact, using focus groups conducted two months after Sunflower Movement. Results show that most students don't rate highly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freedom, and news quality in Taiwan. The Movement has disturb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some have showed in their utterances a more 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 Taiwan and even the imagination of democracy in China, whereas others have set bottom-lines of identifying with Taiwan to avoid losing their identity. We conclude that the Movement is a tester for the effects of social contact: those staying in Taiwan for a long time and undertaking more true acquaintance have confirmed their positive expectation of Taiwan's institutions after witnessing the society's tolerance for diverse voices during the Movement, whereas those staying for a short time and having more casual acquaintance are more likely to notice mainly the "anti-China" ideas in the Movement.

Keywords: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social contact theory, Sunflower Movemen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